

# 从《华严经》的流布看中国文化的传播

冯雪俊

**摘 要:**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如何正确看待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如何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走向世界,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希冀通过梳理和分析《华严经》这一著名的佛教典籍传入中国的路径、它的翻译历程及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的广泛流布,来揭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特点,从而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佛教 《华严经》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B9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2)02—0102—04

**作者简介:** 冯雪俊,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史。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著名典籍之一,也是华严宗据以创立的经典书籍。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学界已经发表的研究《华严经》相关内容的书籍、文章数量颇多,涉及的内容多侧重于《华严经》的哲学思想、内容、版本以及其与华严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而从宗教文化传播这一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国内目前还较为少见。同时,自 1978 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探寻不同民族间、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的规律与特点等,显得日益迫切。故此,本文试图从文化交流这一视角对《华严经》的流传过程进行一个梳理,以期获得一些启示。

印度佛教由印度向其它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大约是从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Ashoka)统治时期(公元前 304—前 232 年)开始的。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王,在他统治期间孔雀王朝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而在治理这一巨大的帝国问题时,阿育王采取、推行的思想领域的政策之一就是佛教的推广。根据一些文献如《大世系》追溯,阿育王曾在首都华氏城召集由佛教上层僧侣参加的第三次大结集,下令整理编纂经、律、论三藏,并向地中海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派遣传教使者,宣传佛教的“法”。另外,他也把解释“法”的圣旨刻在石头和石柱上,安放在国内的交通要道、交易中心,好让过往的行人时时都能看到。因此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东南亚。

《华严经》产生的时代和地区至今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它于公元 2 世纪产生于南印度的案达罗国。佛教是阿育王时进入该国的(案达罗国曾经一度是阿育王治下的一部分地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很流行的宗教。据研究,案达罗国诸王中有多人笃信佛教。像那锡克的刻铭中就已经记载,案达罗王统第二十三代中兴主哥达弥普多罗(Gotami^putra,公元 106 年即位)于即位后的第十八年与其

母后共同为佛教僧侣开凿石窟;第二十四年其母后捐赠石窟予贤胄部之徒等等。所以说,这里是大乘佛教的摇篮之一,般若部和华严类的大部分经典也均产生于此<sup>[1]</sup>。这时的《华严经》所使用的文字是梵文。

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离不开西域。一般来说,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说,狭义上是指今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而广义则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地区。佛教传入我国内陆地区大概是在西汉哀帝时期(公元1世纪末),走的就是印度南部——中亚地区——西域(新疆地区)——河西走廊——西安——洛阳——杭州这样的一条路线<sup>①</sup>。

中国通过西域与印度地区产生联系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华严经》的产生时间恰好与之吻合。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月氏侵入印度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贵霜帝国。月氏又称月支,本来属于氏羌族,生活在今天的甘肃走廊地区。据《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西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向西北迁徙,越过伊犁浩罕,渡过葱岭,最后定都于今天的布哈尔(俄属土耳其斯坦)。之后走向强盛,并进一步南下,占领了帕米尔高原及阿富汗,建都于今天北印度的克什米尔。到了迦腻色迦王时期,大月氏人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印度,成为全印度之共主(公元1世纪初)。这对《华严经》传入我国影响深远。

迦腻色迦王(阎膏珍)时的大月氏,曾经在罽宾(今克什米尔)举行佛藏第二次结集,自此以后,罽宾成为佛教中心。罽宾与于阗接壤,地理位置上的彼此相连,使得《华严经》由罽宾传入于阗成为一种必然。而这时匈奴已经衰落,中原王朝也数度弃置西域,不复经略。所以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诸国,都得以自我发展,其中以于阗、鄯善、龟兹、疏勒最为引人注目,都将佛教奉为国教,“环帕米尔高原四周数万里,便成为佛教的天下”<sup>[2]</sup>。

## 二

作为外来文化,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首先面临的是语言的障碍,因此,从后汉到中唐近700年间,将梵文的佛教经典翻译为汉文,成为佛教发展史上—场轰轰烈烈的事业。

汉文《华严经》的翻译可以根据译经的规模、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时期,由于这时的翻译多系个人行为(主要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从内容看,往往都以零星的个别品目为主。所译的品目主要有《如来名号品》、《净行品》、《十住品》、《十地品》、《离世间品》,只是《华严经》的一部分内容,而非整部作品。从翻译的经文质量看,译者本人的翻译水平、语言水平相比后期有明显差距。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华严经》翻译事业上的第二个阶段,已涉及整部作品的翻译,《六十华严》汉译本问世。《六十华严》梵文原本有三万六千偈。东晋时期(418—420年)由佛陀跋陀罗(359—429年)译出,初分五十卷,后改为六十卷,计三十四品,由七处八会的说法而成。七处即释迦说法的七个道场,八会即释迦说法分为八次。为了有别于后来的唐译本,又称为《旧译华严》或《晋译华严》。该经的内容比较简略,但是译文典雅流畅,优美可读。可惜由于它的文义不完全,虽然译出但却流通不广。《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的译出属于《华严经》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八十华严》梵文原文有四万五千偈,唐代周武时期(695—699年)由实叉难陀(651—710年)奉命译出,华严宗创始人法藏曾参与笔受。译文共八十卷三十九品,由七处九会的说法而成。与旧译相比,增加“普光法堂”一会的内容。后来法藏发现该译本仍有脱漏,遂与地婆诃罗加以补充,译成现今流行的《华严经》八十卷本,一般称为《新译华严》或《唐译华严》。该经内容最为完备,文义也较准确,故而流传最广。

《四十华严》梵文原本有一万六千七百偈,是由南天竺乌荼国王呈贡于唐,德宗下诏罽宾三藏般若(约8世纪至9世纪)于贞元年间(795—798年)译成,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计四十卷一品,简称《普贤行愿品》,属于《六十华严》与《八十华严》最后一品的足本

<sup>①</sup> 自西汉张骞正式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后,丝绸之路的路线有很多条,但都必须经过西域(今天的新疆地区)到达中亚、南亚、西亚地区。

经亦即《入法界品》的异译。不过,与另外两个译本的《入法界品》相比,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 三

依靠强大的中国文化做后盾,唐朝时大乘佛教又将势力范围扩散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回鹘文《华严经》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得以广泛流传。回鹘文《华严经》主要有“四十华严”和“八十华严”两种,目前在新疆、敦煌、兰州等地均有发现,学界有不少学者研究这种文字的版本,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西夏是历史上由我国少数民族党项羌建立的一个地处西北的封建割据政权,强盛时曾统治从今天的内蒙古西南部、陕西北部一直到宁夏北部、甘肃中北部、青海东部一带的广大地区。西夏文是它所创制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当时被称为“蕃文”或“蕃书”。根据史料记载,西夏曾先后数次上书北宋朝廷求取佛教,例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李德明向宋献马70匹,乞赐佛经一藏,遂得开宝藏。开宝藏是北宋年间在成都刊印发行的一套佛教系列全集,是当时佛教最大成就的集中代表。宋景佑元年(1034年),李元昊向宋献马50匹,求赐佛经一藏。同时,李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在兴庆府东15里的地方,役使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屠,俱高数十丈,贮《大藏经》,并且广延回鹘僧在此,将之译为西夏文。西夏王朝得到开宝藏后,曾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其中也包括《华严经》。由于开宝藏主要保留的是唐朝到北宋的佛教典籍,所以《华严经》翻译成西夏文时,主要集中在《四十华严》和《八十华严》两种版本上。

西藏虽毗邻印度,但其地佛教也深受中原影响。当前佛教可以分为四大类:梵文原典、巴利文经典、汉译的中文经典以及藏文经典。在这四类经典中,汉译经典虽然含有印度佛教的大部分,但中、晚期的大乘要典却远不及西藏翻译之多。特别是六、七世纪以后的经典。因此,在藏文佛教经典中,受中原地区汉文化影响、由中原传播过去的《华严经》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典籍,也赫然在目,不可或缺。

隋唐时代,中原的主要高僧已多为汉人,与南北朝时最大的高僧多为西域人或印度人已很大不同。同时,来中原学习佛教的留学生人数也大为增长。例如隋唐天台智者大师是中原人,其弟子般若乃高丽人。唐法相宗大师玄奘是中原人,其弟子分为二派:一派首领是窥基,于阗人;另一派首领是圆测,新罗人。华严智俨系出天水赵氏,弟子一为法藏,康居人,乃华严宗的最大大师;一为义湘,新罗人。这些均说明当时佛教已被汉文化充分吸收,不仅大师是中原人,思想也已汉化。至若外国人求法,往往来华,不一定去印度。因此,朝鲜、新罗完全把中国天台、华严、法相、禅宗照搬了去。而日本所谓古京六宗,实是唐代中国的宗派。日本最早的两个名僧传教法师最澄和弘法大师海空所传所弘的也都是中国佛教。所以到了隋唐,东亚地区求佛法者大都到中国来学习佛法。

《华严经》在韩国的传播可以以一些韩国有名的高僧为线索进行探寻。第一位要提到的是元晓。该僧生于真平王三十九年(617年),是一位奇特的佛教人物。他对佛经的疏释多达八十一部,现存者尚有十六部,他的疏释范围非常广博,其中就包括《华严经》。

新罗朝文武王十年(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高僧义湘自唐求法回到新罗,弘传华严宗。义湘(625-702年)20岁出家,文武王元年(661年)搭乘唐朝使节的便船来到中国,于终南山谒华严二祖智俨,入室受华严妙旨。回国后创浮石寺,开演华严一乘,圣德王元年(702年)以78岁的高龄入寂。义湘一生著有《法界品钞记》、《大华严十门看法观》、《华严一乘法界图》等相关著作。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十大德: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等。这些弟子后来又成为继他之后传播《华严经》的主力。由于义湘与法藏贤首大师是同门同学,法藏于唐中宗嗣圣九年(692年)曾派胜詮带给义湘一信,并赠所著《华严经疏抄》及《探玄记》等,法藏还在信中尊义湘为“海东新罗大华严法师”<sup>[3]</sup>。到了第二十五代景德王(742-764年),又出了一位大著家大贤法师,或名太贤,是玄奘的第四传弟子,也曾学习《华严经》。

“《华严经》传到日本是很早的,在元正天皇养老年间(714-723年),天皇为追善修福曾已让人誊写了《华严经》。”<sup>[4]</sup>天平八年(736年)道璿律师从中国洛阳到达日本,据说带去许多《华严经》的章

疏,而且与他同船的婆罗门僧正也经常诵读《华严经》。另外,当时新罗的宙祥高僧也到了日本,住在大安寺,他精通华严宗深义。“后被日本良辨僧正在天平十二年,请到金钟寺道场首次开讲《华严经》。”<sup>[5]</sup>

凝然是13世纪日本华严宗的著名大德。其人博学多闻,善于著作讲说,是当时日本佛学界所同钦的佛教学者。其一生致力弘扬的是华严与戒律。所著《八宗纲要讲义》在讲述华严宗的传承时,认为自道睿和良辨之后,华严宗的流传从未中断过。由此可知《华严经》的流布也没有中断过。

有关越南佛教的传入路线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中以沙畹(Ed. Chavannes)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越南佛教来自中国。而且是在中国强有力的时候传至越南。他认为“自从中国接受了佛教影响之后,就产生了反映,它大大地帮助了佛教的发展。凡汉文所及的地方,就是说,南至越南北至高丽,佛教亦随之而传播。”还有像越南著名学者陈文理认为“佛教输入安南应在二、三世纪,一方面是由于189年汉灵帝死后,至交趾避难的中国人所传播,而另一方面,由于康居、月氏、天竺求法僧的传播。”<sup>[6]</sup>至于《华严经》的流入越南,根据陈正和的论述,“从李朝至陈朝(1010-1404年),佛教正式成为越南的国教。李朝时期,每隔五年派遣使臣入宋求《大藏经》。陈朝同样频繁地开设法事道场,在国内印刷佛教经典和佛教绘画,散布民间”<sup>[7]</sup>,“光中帝阮惠对以佛教为首的各宗教采取完全平等的政策。众多大寺院,由国家出资修整,小寺院则基本被撤销。另外,还把多数佛典译成越文。”<sup>[8]</sup>

最后要指出的是,宋朝时期中国政府刻印的《大藏经》,《华严经》是其中一部重要的经典。

#### 四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佛经《华严经》在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广泛流布,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文化交流是以你有我无、我有你无为前提的。佛教来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对一个体系完整、理论成熟的宗教的需要。因此,佛教的东传实际上是中国人宗教需要的直接结果。其中,《华严经》作为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有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理论,这就充分满足了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部分需求。第二,文化交流必须注重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一定宗教思想的集中表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都是如此。但是一定宗教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它有着一个从酝酿到产生乃至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华严经》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就是因其宗教思想之博大精深。同理可证,中国文化向外的传播也必须具有这方面的特性。第三,交流的内容要有代表性。一种思想包括宗教思想的流传,需要寻求普通大众的广泛接受。普通人们广泛接受的,就应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和文化。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应如此。第四,文化交流还要有包容性。博大精深的《华严经》也因为企图无所不包、博采各家所长而显得过于驳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其杂糅,所以不同的人都能找到各自的需求,有利于其被广泛接受。第五,文化交流内容的积极性。早在几千年前关于人性的讨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即“性善论”、“性恶论”、“环境决定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类彼此之间的学习仍然是以积极、健康、向上、乐观为其主旋律的。第六,要有意识地推行文化输出政策。《华严经》的广泛流传还与佛教国家和佛教僧侣的宗教输出意识和宗教输出政策有关。翻译《华严经》的僧人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他们为了宣扬佛法,不畏路途遥远、前途危难,用他们的生命和热情将佛教带到中国,并积极将《华严经》译为中文。第七,所传文化要有较强的适应性。《华严经》能从古代印度流布到中国内地及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到达朝鲜半岛、日本,主要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其对自身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番调整。

#### 参考文献:

- [1][2]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79-86.
- [3][台] 圣严. 韩国佛教史略[A]. 现代佛学大系(17) [C].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2. 90-93.
- [4][5][日] 村上专精. 日本佛教史纲[C]. 杨曾文译.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35-36.
- [6][越] 陈文理撰 黄铁球译. 越南佛教史略[A]. 东南亚研究资料[Z]. 1985. 54-63.
- [7][8][越] 陈正和 宋称有节译. 越南佛教史略——从古至今[J]. 印支研究, 1984 (3).